

中|华|国|学|文|库



文史通义校注 上

章学诚 撰

叶 瑛 校注

中 华 书 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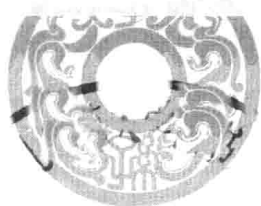
中 | 华 | 国 | 学 | 文 | 库



文史通义校注 上

〔清〕章学诚 撰

叶 瑛 校注



中 华 书 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史通义校注/章学诚撰;叶瑛校注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4. 11

(中华国学文库)

ISBN 978 - 7 - 101 - 10462 - 2

I. 文… II. ①章…②叶… III. ①文史 - 研究 - 中国 - 清前期②《文史通义》 - 注释 IV. K092.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26463 号

-
- 书 名 文史通义校注(全二册)
撰 者 章学诚
校 注 者 叶 瑛
丛 书 名 中华国学文库
责任编辑 俞国林 李碧玉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 32 $\frac{1}{8}$ 插页 4 字数 760 千字
印 数 1 - 8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10462 - 2
定 价 78.00 元
-

中华国学文库出版缘起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的出版缘起,要从九十年前说起。

1920年,中华书局在创办人陆费伯鸿先生的主持下,开始编纂《四部备要》。这套汇集三百三十六种典籍的大型丛书,精选经史子集的“最要之书”,校订成“通行善本”,以精雅的仿宋体铅字排印。一经推出,即以其选目实用、文字准确、品相精美、价格低廉的鲜明特点,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人研治学问、阅读典籍的需要,广受欢迎。丛书中的许多品种,至今仍为常用之书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,党和国家倡导系统整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。六十余年来,在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整理方法的指导下,数千种古籍得到了系统整理,并涌现出许多精校精注整理本,已成为超越前代的新善本,为学界所必备。

同时,随着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快速发展,全社会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——国学,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。让中华文化的优秀成果得到继承和创新,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,普惠全人类,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。当此之时,符合当代国民阅读需要的权威的国学经典读本的出现,实为当

务之急。于是,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应运而生。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是我们追慕前贤、服务当代的产物,因此,它自当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点:

一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为中国学术文化的“最要之书”。举凡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宗教、科学、艺术等各类基本典籍,只要是公认的国学经典,皆在此列。

二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“最善之本”,即经过精校精注的最有品质的整理本。其中既有传统旧注本的点校整理本,如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也有获得学界定评的新校新注本,如余嘉锡《世说新语笺疏》。总之,不以新旧为别,惟以善本是求。

三、《文库》所选均以新式标点、简体横排刊印。中国古籍向以繁体竖排为标准样式。时至当代,繁体竖排的标准古籍整理方式仍通行于学术界,但绝大多数国人早已习惯于现代通行的简体横排的图书样式。《文库》作为服务当代公众的国学读本,标准简体字横排本自当是恰当的选择。

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将逐年分辑出版,每辑十种,一次推出;期以十年,以毕其功。在此,我们诚挚希望得到学术界、出版界同仁的襄助和广大读者的支持。

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,至今已近百岁。我们将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当作向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敬献的一份贺礼,更是向致力于中华民族和平崛起、实现复兴大业的全国人民敬献的一份厚礼。我们自当努力,让《中华国学文库》当得起这份重任,这份荣誉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10年12月

出版说明

《文史通义》是清朝乾、嘉时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著作。章学诚(一七三八——一八〇一)字实斋,浙江会稽(今绍兴)人,是著名的史学家,曾经为和州永清县和亳州编写县志和州志,又编写《湖北通志》,著有《章氏遗书》,从中选出精要部分为《文史通义》,后附《校讎通义》。

章学诚著作《文史通义》想挽救当时的学风。他在《上辛楣宫詹钱大昕》的信里说:“世俗风尚,必有所偏,达人显贵之所主持,聪明才俊之所奔赴,其中流弊必不在小。载笔之士不思救挽,无为贵著述矣。苟欲有所救挽,则必逆于时趋。”他看到当时学风的流弊,想加以挽救。他说的“达人显贵之所主持”,当指朝廷提倡宋学;“聪明才俊之所奔赴”,当指当时的学者都趋向汉学。宋学讲心性,认为“理在气先”,离事物而言理,不免空疏;汉学讲考证,治学不本于性情。章氏在《原学下》提出批评道:“学博者长于考索,岂非道中之实积;而骛于博者,终身敝精劳神以殉之,不知博之何所取也。”又说:“言义理者似能思矣,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,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。”因此他在《浙东学术》里提出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”,

反对空谈性命；在《博约下》说“言学术功力，必兼性情”，“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所能勉者而施其功力”，反对不顾资质专讲考据。当时的经学，主张道在《五经》，可以从通文字音韵训诂来通经，通经来明道。汉学的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正所以明道，这就把汉学和经学结合了。他在《原道上》里对通经来明道的经学提出批评，他说：“道者，万事万物之所以然，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。人可得而见者，则其当然而已矣。”由于人们看到的当然不同，法制也跟着不同。“三皇无为而自化，五帝开物而成务，三王立制而垂法，后人见为治化不同如是。”那末圣人怎样去认识道，认识“万事万物之所以然”呢？“圣人求道，道无可见，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，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。”“学于众人，斯为圣人。”他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，这种所以然只能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中去找，不能从经书中去找。这样，他要在当时的宋学、汉学、经学外另外开辟一条治学的道路，反对当时的学风。

他要开辟一条怎样治学的路呢？《原道下》说：“夫道备于六经，义蕴之置于前者，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；事变之出于后者，六经不能言，固贵约六经之旨，而随时撰述，以究大道也。”“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，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，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。”“《易》曰：‘神以知来，智以藏往。’”他主张研究事变，要解决后来的事变，六经里没有，可以取六经的用意做参考，观察众人的所需、所郁、所弊来解决。他的目光在借古通今，借古是智以藏往，通今是神以知来，可见他更重在通今。《原道下》附有邵晋涵说：“是篇初出，传稿京师，同人素爱章氏文者，皆不满意。谓蹈宋人语录习气，不免陈腐取憎，与其平日为文不类。”他的卓识深心，在当时爱章氏文者都不理解，其他的人更不用说了。因此，他不可能在当时真正开辟出一条新的治学的路来。

他的成就还在史学、文学和校雠学上。他在《家书》二说：“吾于史学，盖有天授，自信发凡起例，多为后世开山，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。不知刘言史法，吾言史意；刘议馆局纂修，吾议一家著述。截然两途，不相入也。”如刘知几《史通·六家》批评《史记》：“寻《史记》疆宇辽阔，年月遐长，而分以纪传，散以书表。每论家国一政，而胡、越相悬，叙君臣一时，而参、商是隔，此其为体之失也。兼其所载多聚旧记，时采杂言，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，而语饶重出，此撰录之烦者也。”认为《史记》把一时的事分散在纪传书表里不集中，多引用旧书，显得重复。但赞美《汉书》：“包举一代，撰成一书，言皆精练，事甚该密。”其实事件的分散和引用旧书，这两点《汉书》跟《史记》一样，不过一为断代史、一为通史罢了。刘的推重《汉书》而贬低《史记》，只是偏重断代史而贬低通史，对纪传体的不足处并不能补足。章氏对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评价和刘氏不同。他在《书教下》说：“迁书通变化，而班氏守绳墨。”“迁书体圆用神，班氏体方用智。”守绳墨指有定法，通变化指根据人事的变化来写，自有用意，如“《伯夷列传》乃七十篇之序例，非专为伯夷传也。《屈贾列传》所以恶绛、灌之谗，其叙屈之文，非为屈氏表忠，乃吊贾之赋也”。他认为刘讲定法，所以赞美《汉书》；他讲用意，所以推重《史记》。

他在《答客问上》说：“君臣事迹，官司典章”，“纂辑比类，以存一代之旧物，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。开局设监，集众修书，正当用其义例，守其绳墨”。他认为刘所讲的就是这种开局修书的义理。至于他讲的史意，“固将纲纪天人，推明大道，所以通古今之变，而成一家之言者，必有详人之所略，异人之所同，重人之所轻，而忽人之所谨，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，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，而后微茫杪忽之际，有以独断于一心”。他注意的在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。他对史书体例的看法也是这样。在《书教下》说：“司马

《通鉴》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，袁枢《纪事本末》又病《通鉴》之合，而分之以事类。按本末之为体也，因事命篇，不为常格，非深知古今大体、天下经纶，不能网罗隐括，无遗无滥，文省于纪传，事豁于编年，决断去取，体圆用神。”把纪事本末体这样推重，是他的创见，后来新的历史书的编著，证实了他的远见。他又提出“史德”，这也是刘所没有提到的。

就文学看，他的《史德》，是史学通于文学。他说：“凡文不足以动人，所以动人者气也；凡文不足以人人，所以人人者情也。气积而文昌，情深而文挚，气昌而情挚，天下之至文也。然而其中有天有人，不可不辨也。”“气合于理，天也，气能违理以自用，人也。情本于性，天也，情能汨性以自恣，人也。”《史德》要求文章写得完全符合于事理，不能有丝毫的偏私，从而推求到情和气，这也是他论文的主旨。他又写了《文德》，也是文学和史学相通的。他说：“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。”敬要“气摄而不纵，纵必不能中节也”，恕要“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”，这也要求论文必求符合事理不能有偏私。他讲的为古人设身处地，是说陈寿在晋作《三国志》，晋承魏，不得以魏为主；习凿齿在东晋偏安一隅时写《汉晋春秋》，不得以偏安一隅的蜀汉为主。这又是论文而通于史了。他对于清代推重的明朝归有光和桐城派开创者方苞都有不满，他在《文理》里批评归有光用五色圈点来评论《史记》：“今归、唐（顺之）之所谓疏宕顿挫，其中无物，遂不免于浮滑，而开后来以揣摩浅陋之习。故疑归、唐诸子，得力于《史记》者，特其皮毛，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。”他在《答问》里批评方苞：“或问近世如方苞氏，删改唐、宋大家，亦有补欤？夫方氏不过古人所谓本不甚深，况又加以私心胜气，非徒无补于文，而反开后生小子无忌惮之渐也。”他的论文，像《文理》说的：“古人著为文章，皆本于中之所见，初非好为炳炳烺烺，如锦工

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。”他先要探求古人本于中之所见，与古今文章的流变，作者的成就，不满于归、唐与方苞的所得者浅，只追求所谓疏宕顿挫。他在《文集》里提出“因文以求立言之质”，看它有没有真识。他在《陈东蒲方伯诗序》里论诗书要求立言之质，认为“令翻译者流，但取诗之意义，演为通俗语言，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，迥然其不同于人者”，才是可称的诗了。他论文批评归、方的无学无识，主张辨章学术，就通于校讎学了。

就校讎学看，他在《校讎通义序》里说：“校讎之义，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，将以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，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与此。”用意在于考求学术源流，深通道术精微。因此，他的校讎对各种书要按照它的学术源流来分，还要考求群言得失。一书而分属两类的有互著，一书而其中有的篇章可属另一类的，可以裁篇别出。这样来谈校讎，已经扩大了校讎的原意，不限于校对书籍，把刘向、刘歆的部次条别编定《七略》都包括在内了。按照他的校讎学，那末《四库提要》，还得像《七略》那样，著为一书，来辨章古今学术源流，条别它的得失，当时的学术界是不能接受的。

对这样一部重要著作，到一九三五年，才有福建闽侯县叶长清先生的《文史通义注》，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丛书之十一。叶注有注无校。叶瑛先生作《文史通义校注》，始于一九二九年，完成于一九四八年。叶瑛字石甫，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安徽桐城西乡陶冲驿，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。先后任教于吴淞中国公学、天津南开学校及任武汉大学教授，一九五〇年去世，年五十四。他的校注告成时，看到了叶注，把叶注的胜义采入校注，并加注明。校注比叶注更为详密。校注用浙江书局本、粤雅堂丛书本等九个本子，其中刘咸炘校志古堂刻本、庐江何氏钞本更重要。何本按语，可考订

《文史通义》各篇的作年和有关文献。如四三一页注〔一〕等是。刘本可以补原书的脱文，如一一二页正文：“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（之，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，有所弊而后从而）救之。”括号中的话是校注从刘本《遗书》补的。又六〇三页原文注：“（《儒林》叙董仲舒、）王吉，别有专传。”括号中的话，也是校注从刘本补的。还有个别文字的改正。校注还据刘本补录有关章氏原文，如在七三一页注〔五八〕中据刘本补录章氏《金石叙录》，可作这篇《永清县志文征序例》的参考。在九一六页注〔五〕里据刘本补录章氏论郑樵评《汉志》的一节，可作这篇《郑樵误校汉志》的参考。

注文征引原文出处，能纠正章氏原文的疏漏。章氏在《家书》二里说：“吾读古人文字，高明有余，沉潜不足。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，而神解精识，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。”他在《报黄大俞先生》里说：“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。”因此读章书当领会他的创见，但注意章氏书正要补他的疏漏，校注做到了这点。如一二三页原文“《礼》自宗伯，《乐》有司成”，章氏误以“司成”为主乐之官。一二七页注〔二七〕引“乐正司业，父师司成”来纠正章氏的误解。又三七七页原文《汉志》儒家有《平原君》，章氏以赵胜著《平原君》入儒家为说。三八三页注〔二五〕引章太炎说，以《平原君》为朱建来订正等。

这次刊印校注遗稿，必要时稍加修补。有题意不明的，如《浙东学术》，原文称“浙东之学，虽出婺源（朱熹），然自三袁之流，多宗江西陆氏”，按朱熹与陆九渊皆言性理，浙东学术言经世致用，此点主要区别，本篇何以不言？又浙东学术一般推吕祖谦、陈傅良、叶适、陈亮，与朱、陆不同，此篇于诸人何以不谈？何以言浙东之学出于朱、陆？原注对此皆无说明，因加补注，以说明题意。又如六〇二页正文“史家所谓部次条别之法”，下引“孟荀三邹、老庄申韩”等

传作例,原注未言此等合传部次条别之义例,因加申说。又注文有漏注篇名的补篇名,如三六三页注〔六〕引张祜诗,补《赠志凝上人》题;四二二页注〔九〕引《颜氏家训》,补《风操》篇名等。注中引文过深的,稍加简注,如十七页注〔二五〕所引《尚书》文稍加简注。校注在纠正原文疏漏处还可补充的,作了补注,如五五一页正文:“唐人修五代地志(即《隋志》)。”按《隋书·地理志》以炀帝时的一百九十郡、一千二百五十五县作志,于郡下不言五代沿革,不得称五代地志。又六一六页正文注:“吕氏十二纪似本纪所宗。”按《史记·大宛传赞》两言《禹本纪》,为《史记》所本,章说未是,但章用“似”字,尚未肯定。校注引《文心雕龙·史传》“取式《吕览》,通号曰纪”,更肯定了,因加改注。注文有疏漏的,亦稍加补正,如一五三页正文:“以良知为讳,无亦愆于末流之失。”校注未注“末流之失”,因引泰州学派之狂纵作补。如二八九页正文:“譬若《月令》中星不可同于《尧典》,太初历法不可同于《月令》。”二九一页注〔九〕注〔一〇〕未注“不可同于《尧典》”与“《月令》”,因加补注。校注和稍加补正处,一定还有疏漏或错误,尚望专家和读者指正,以便于再版时改正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一九八三年五月

题 记

吾国学术，源远流长，载籍之富，蕴藏之丰，甲乎世界；初涉其藩，茫无涯涘，不有书焉为之津逮，鲜有不兴望洋向若之叹者。清会稽章实斋学诚先生所著之《文史通义》，辨章学术，考镜流别，端学人之趋向，明立言之指归，洵有心国故者所宜先读之书也。先生生平著述宏富，而自谓“性命之文，尽于《通义》一书”。《跋戊申秋课》，刘刻《章氏遗书》卷二十九。时通人如段若膺玉裁，见其《通义》有精深者，亦与叹绝。《与史余村简》，《遗书》卷九。而焦里堂循《读书三十二赞》，《文史通义》列于十九。其书见重当时已如此。顾先生怀才不遇，侘傺终老，不为时流所知。有翁方纲者，曾询刘端临台拱，实斋学业究何门路。《家书》二，《遗书》卷九。翁氏居高位，工书法，有名于时，而相惊河汉若是，最足以代表当日士林对于先生之反应。而先生不自秘惜，每一篇成，恒写寄友人，人间传录，多有异同，剽窃其辞意而讳其所自。《与邵二云论学书》云：“生平所得，无不见于言谈，至笔之于书，亦多新奇可喜；其间游士袭其谈锋，经生资为策括，足下亦既知之。近则遨游南北，目见耳闻，自命专门著述者，率多阴用其言，阳更其貌，且有明翻其说，暗剿其意，几于李义山之敝缁，身无完肤；杜子美之残膏，人多沾丐。鄙昔著《言公》篇，久有谢名之意，良

以立言垂后,无非欲世道之阐明,今既著有文辞,何必名出于我。”《遗书》卷九。其思想议论影响于当世者又如此。百余年来,先生之学渐显,洎乎今日,几于家有其书矣。然知其学者未必能谙其识,歆以迹者未必能接以心,此所以读其书求其旨而不得者十常八九也。

先生之学,盖远祖阳明、戴山王守仁、刘宗周,近祧梨洲、思复黄宗羲、邵廷采,所著《浙东学术》一文,乃先生自道其学之所从出,讲性命而兼攻史学,固是浙东学派一脉相传者。先生一生景仰余姚邵廷采念鲁。邵氏所著《思复堂集》,先生叹为五百年来所罕见。以为“班、马、韩、欧,程、朱、陆、王,其学其文,如五金贡自九牧,各有地产,不相合也,洪炉鼓铸,自成一家,更无金品州界之分,谈何容易!文以集名,而按其旨趣义理,乃在子史之间,五百年来,谁能办此?”《邵与桐别传》后贻选按语,《遗书》卷十八。故其为学宗旨,即欲步趋邵氏,萃合马、班之史,韩、欧之文,程、朱之理,陆、王之学,以成一子之书。而性耽史学,出于天授,发凡起例,多为后世开山。而其别识心裁,在明史意,不在言史法,取著述成家,不取方圆求备,自谓与刘知几截然两途者在此。先生有此抱负,惜未能绌石室之秘藏,成名山之鸿业,尝约邵二云晋涵改修《宋史》,欲为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者,既美志不遂,而为毕秋帆所修造端宏大之《史籍考》,亦未能卒业,乃仅应用其理论而小试之于方志。方志之在前人,多为图经之概念所囿,视为地理之书而已。先生则以为方志乃《周官》外史小史之遗,为国史之所取资,其视国史,具体而微耳。吾国方志学之成立,自先生始。所修和州、永清、亳州诸志,及《湖北通志稿》等,其创造天才,从可概见。然先生深识所寄,不在是也。《与严冬友书》云:“日月倏忽,得过日多,检点前后,识力颇进,而记诵日衰。思敛精神为校讎之学,上探班、刘,溯源官礼,下该《雕龙》《史通》,甄别名实,品藻流别,为《文史通义》一书,草创未多,颇用自赏。”

《遗书》卷二十九。外著有《校讎通义》，自成一家之言，于吾国学术源流及宗旨，辨之最哲。《文史通义》辨宗旨，《校讎通义》辨源流。源流清，则各种学术地位之高下轻重，其间互相之关系，豁然呈露。宗旨明，则衡定古今述作，正伪纯驳，若坐堂上而指数之于堂下也。先生尝谓“史学本于《春秋》，专家著述本于《官礼》，辞章泛应本于《风诗》，天下之文，尽于是矣。子有杂家，杂于众不杂于己，杂而犹成其家者也。文有别集，集亦杂也，杂于体不杂于旨，集亦不异于诸子也。故诸子杂家与文集中之具本旨者，皆著述之事，立言之选也。”《立言有本》，《遗书》卷七。著述贵有宗旨，而辨之不可不严。与先生并世诸贤，若休宁戴东原，通经服古，一贯多闻，学出于朱子，而反以攻朱为能事，乃先生平日反对最力者也。而称其“所学深通训诂，究于名物制度，而得其所以然，将以明道也。著《论性》《原善》诸篇，于天人理气，实有发前人所未发。”《书朱陆篇后》本书附录。若江都汪容甫中处考证风气正盛之时，斐然有志于著述，期欲有所树立，先生许为工辞章而优于辞令者也。而所著《述学》，内其所外而外其所内，病其“博学能文，而不知宗本。”《立言有本》，《遗书》卷七。若余姚邵二云，远承家学，汲流浙东，精训诂而兼长史裁，敦孝行而知尊文献，为先生平日所最引为深契者也。而论为学祈向，则谓“足下于文，漫不留意，立言宗旨，未见有所发明，此非足下有疏于学，恐于闻道之日犹有待也。”《与邵二云论学》，《遗书》卷九。批评人物，有时似近深刻，而持论警辟，辄能洞垣一方，非惟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也，而立言宗旨，辨之惟恐不严，从可知矣。

不第此也，先生立说之用意，有盛心在，不仅为文史计也。清代学风，肇自亭林顾炎武，至乾、嘉间，大师辈出，惠定宇、庄方耕、惠栋、庄存与兴于吴，戴东原、程易畴、戴震、程瑶田兴于皖，而江、淮间汪容甫、刘端临、王怀祖、孙复翁声桴应而起，以考证训诂讲经学，风靡一

时，洗肤受之疏陋，宏汉家之遗绪，其茂绩度越前古，可云盛矣。先生起于浙东，独病其时“风气征实过多，发挥过少，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。”《与汪龙庄书》，《遗书》卷九。故平日论学，不主逐时趋而徇风气，而主逆时趋而持风气，良以“所贵君子之学术，为能持世而救偏”故也。其《文史通义》一书，即半为矫正此种风气而作。其言曰：“《文史通义》，专为著作之林校讎得失。著作本乎学问，而近人所谓学问，则以《尔雅》名物，六书训故，谓尽经世之大业，虽以周、程义理，韩、欧文辞，不难一映置之。”《与陈鉴亭论学》，《遗书》卷九。当时偏重考据，而略弃义理与辞章，流弊至此。又曰：“学诚从事于文史校讎，盖将有所发明；然辩论之间，颇乖时人好恶，故不欲多为人知，所上敝帚，乞勿为外人道也！”《上钱辛楣宫詹书》，《遗书》卷二十九。又曰：“鄙著《文史通义》之书，诸知己者，许其可与论文，不知中多有为之言，不尽为文史计者。关于身世有所桎触，发愤而笔于书。尝谓百年而后，有能许《通义》文辞，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，是仆身后之桓谭也。”《与朱少白》，《遗书》逸篇。以其与时异趋，不为时流所喜，弦外之音，不无身世寂寞之感，而自甘为举世不为之学，期以持世而救偏，则自信之笃，固可质鬼神而无疑，俟百世而不惑者矣。

然先生之反抗时代风尚，非故自立异以鸣高，好恶有拂人之性也。良由先生高瞻远瞩，不为时代风气所囿，晓然洞明于经史百家支与流裔，而有以得其大原。故其论学，千举万变而不穷于辩，昂首天表而不汨于俗。其基本观念“即器以明道”一语，足以蔽之。《易》曰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道不离器，犹之影不离形。造学之途有百，而其要期于明道。故曰：“学者，学于道也。道混沌而难分，故须义理以析之；道恍惚而难凭，故须名数以质之；道隐晦而难宣，故须文辞以达之：三者不可有偏废也。”《与朱少白论文》，《遗书》卷二十九。又曰：“学博者长于考索，岂非道中之实积？而

骛于博者，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，不思博之何所取也。才雄者健于属文，矜其艳于云霞，岂非道体之发挥？而擅于文者，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，不思文之何所用也。言义理者，似能思矣，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，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。”《原学下》，本书卷二。故为明道而治学，则学有指归，即器以明道，则道非虚牝，由是而立言，则言出于己，而所以为言者非由己也。世儒言道，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，故诵法圣人之言，以为圣人别有一道，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，是离器而言道也。故宋学流弊，“以道名学，而外轻经济事功，内轻学问文章，则守陋自是，枵腹空谈性天，无怪通儒耻言宋学也。”《家书五》，《遗书》卷九。其治汉学者，知即器以求之矣，而其致力之途，初不出乎名物、度数、章句、训诂之间，以为学问在是，而不知是乃明道之具，而非道也。清代学者，自亭林以来，惩于王学末流空疏之弊，主张实事求是，倡经学即理学之说，以为道在六经，学者穷经有得，为已尽天下之能事。先生则以为道在事物，学者明道，在即事物而求其所以然，六经固不足以尽之。故曰：“道备于六经，义蕴之匿于前者，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。事变之出于后者，六经不能言，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，以究大道也。”《原道下》，本书卷二。知即器以明道，故知古人不离事而言理。知古人不离事而言理，则知六籍皆经世之书，而初非空言。其中所蕴含先民之智慧与经验，多具有普遍性与永久性，能阐发而日新之，在在与吾人现实生活相联系。此六经皆史之说，微意所在也。

虽然，学固贵明道矣，而学问本乎性情，所谓道欲通方而学贵自得。故先生论学教人，最尊重个性。人生难得全才，得于天者，必有所近。从其性之所近，尽其力之所能，因以推微而知著，因偏以得全，此不拘于从入之途，人人可自勉焉者也。若夫“不问天质之所近，不求心性之所安，惟逐风气所趋，而徇当世之所尚，勉强为